

试论晚清官书局的创立

张宗友

晚清时期,各省督抚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纷纷开设书局,以刊刻经史子籍,振兴封建文教。而向来学者,多以晚清官书局为曾国藩所创立。如近人刘声木《苕楚斋续笔》中说:“同治年间,曾文正公国藩踵前代南监本、北监本之例,创立官书局。”^①况周颐《蕙风簃二笔》云:“咸丰十一年八月(1861),曾文正克服江南,部署确定,命莫子偲大令采访遗书,既复江宁,开官书局于冶成山,此江南官书局之俶落也。”^②(按:曾氏于冶成山开局,实在同治三年(1864)金陵攻克后)又《清史稿·艺文志》称:

曾国藩督两江,倡设金陵、苏州、扬州、浙江、武昌官书局,张之洞督粤,设广雅书局,皆慎选通儒,审校群籍,广为剞劂,以惠士林,而私家校勘,精镂亦夥,丛书之富,曩代莫京。^③

查曾国藩设局刊书,系始于夺取安庆之后,设局刊《王船山遗书》,后迁至金陵。《续纂江宁府志》谓:“同治三年(1864)四月,总督曾文正公刊《王船山遗书》,立局安庆,江宁收复,移局东下,初设于铁作坊,后移江宁府学之飞霞阁。”^④而柳诒徵先生《国学书局本末》则云:“清同治二年,曾国藩为江督驻安庆,其弟曾国荃督兵围攻金陵,捐贖养士,刻《王夫之遗书》。军书旁午之时,文人学者,辐辏安庆,从事校刊。”^⑤又引闵萃祥《张先生

（文虎）行状》云：“安庆克复，长江轮船通行，遂具书李壬叔先生来招，属以内军械所事，而今制军威毅伯曾公，方刊其乡先辈王船山先生书，庀局（于）皖，即延先生及仪征刘伯山先生毓崧分任校讎。甲子大军克江宁，文正公移节之任，先生与偕，以书局自随。”^⑥（按：湘军攻占金陵，时在同治三年六月十七日）

关于曾氏设局安庆的日期，以上各说互不相同。《泾舟老人年谱》同治三年下载有：“四月初三日，曾文正公设书局于皖城，刊刻经史。”^⑦日期非常具体明确。泾舟老人洪汝奎，字蓬舫，号琴西，曾任金陵书局提调一职多年，当谙熟书局历史。再与上引《江宁府志》所载相对照，那么这个日期应该是可信的。

也有的学者认为，安徽官书局——曲水书局（又名曲江书局）即由曾氏安庆之局发展而来，并认为“安徽官书局实为清末各省官书局的嚆矢”。^⑧如此说来，那么曾氏安庆之局更成了各省官书局的源头。

实际上，在曾国藩于安庆、金陵设局刊书之前，当时的另一位督抚大员左宗棠已经开始了创设书局刊印书籍的活动。近人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中称：

今各直省多设书局矣，而事则肇于左爵相，局则肇于宁波。爵相创军府于严州，严当兵燹之后，田畴荒芜，草木畅茂，遗民无所得失。爵帅于赈济之外，发银万两购买茶筍，俾百姓得采撷于深山穷谷以为资，茶筍制成，扎（札）发宁波变价，往返二次，归正款外，得羡金数千两。爵相以乱后书籍板片多无存者，饬以此羡余刊刻四书五经。嗣杭城收复，复于省中设局办理，即以宁波之工匠从事焉。苏州、金陵、江西、湖北相继而起，经史赖以不坠，皆爵相之首创也。^⑨

（按：太平军在英国殖民军队的无理进逼下于1862年5月撤出宁波；左宗棠于1863年1月袭取严州。）

明确将官书局首创之功，归于左氏。左宗棠自己也数次提到设局

刊书之事：

不佞少贫嗜学，苦无钱买书，于家塾中得见桂林陈文恭公在湖南刊行《四书》大字本及《五种遗规》，又于亲戚书塾中得见仪封张清恪公正谊堂汇刻先儒各种书残缺本，辄欣然忘食。厥后抚浙，见歙鲍氏所刻《六经》，较文公大字本为精，遂取刻之。由宁波招致手民，期年告成，今所行之影刻本也。……^⑩

照得陕、甘回变以来，古籍销之，诵习久废，《五经》、《四子书》坊间素无善本，近并坊本亦购觅维艰。屡据汉、回士民禀求颁发书籍，虽经随时由西安购取散给，既属无多，且坊本讹舛相因，无从校正。因念本爵大臣同治三年戡定浙江时，曾捐廉觅匠影刊鲍刻《六经》，最为精好，亟应翻刻。此本散布各府厅州县书院乡塾，俾边隅士子于古籍销亡之后，复得善本，以资诵习，庶经正民兴，异时有望也。^⑪

按左氏设局刊书，当在袭取严州之后，即始于同治二年（1863）。秦翰才《左宗棠年表》同治二年下记有“十二月……在宁波刻书”等语，次年（1864）下有“二月，……复杭州省城……设书局刊刻经籍”等语^⑫。盖左宗棠刊书之初，并无局名，手民（刻工）由宁波招致。从他的刊书实践上来看，当略早于曾国藩。

根据现有资料，我们认为最早设书局刊书的，当推军政大员胡林翼。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称：“东南文字，尽毁于贼，胡文忠在湖北，首开书局，刻《读史兵略》、《弟子箴言》。”^⑬胡林翼文武全才，向与曾国藩齐名，是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一员干将。他痛心于清政府的武备松弛，认为：“天下之治，常肇于忧勤。而其乱也，皆由于放（纵）逸乐。君子耽其禄而不忧其职，小人溺于俗而不忧其不可常顾。屑屑焉，上下偷薄幸其苟且安乐，以没其世，此召祸之最巨者也。”“是故激而为兵戎祸之燎原者矣，或

营或竟，争踰其则；知巧迭构，强弱相贼，于是敌国外患纠纷侵夺。”“然而转移气化之柄，则赖在上者有以防患于未萌。”把治乱的希望寄托在统治阶级身上。于是，他师法孔子作《春秋》、宋臣司马温公（光）编《资治通鉴》成例，遍览史籍，“因条取其言兵者汇编之，以朝夕循览，期庸顽钝”，使“庶几览斯编者，忧世风之日下，而思整武以豫为之防，以无悖于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之义云尔”，直接为清廷培养军事人才服务。^⑭这是他设局刊书的直接原因。

按：胡氏所编之书即为《读史兵略》。《胡文忠公年谱》咸丰九年（1859）下谓：“纂《读史兵略》，自订体例，开局武昌，属门人汪士铎梅村总其事。独山莫友芝子偲、武昌张裕钊廉卿、长沙丁取忠果臣、张华理燮庵、汉阳胡北春等分任编校。”^⑮该书于1862年春刻竣。

考察这一阶段官书局的创办情况，我们不难看出，最早设局刊书的，当属胡林翼；首开设局刊刻经籍风气的，应推左宗棠；而声名远播、影响最大的，则是曾国藩。这与曾氏位居“中兴名臣”之首的巨大威望有关。作为地方官刻的一种新现象，我们还可以看出这一阶段设局刊书的一些特点：

首先，书局创设于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炮火中。胡氏武昌之局，左氏宁波、杭州之局，曾氏安庆之局，莫不如此。其次，设局目的各有不同。胡氏从军政着手，刊刻《读史兵略》；为统治阶级培养军事人才；左氏刻鲍氏《六经》，以其质好而为之，以期“经正民兴”、“经史赖以不坠”；曾氏刻《王船山先生遗书》，因为王夫之是湖南乡贤名儒，声望威重，且与曾氏同乡。再次，各局无正式局名，机构亦不甚健全，而且刻书有限。胡氏刻了《读史兵略》、《弟子箴言》、《大清一统舆图》、《练勇刍言》、《水经注图》等有限几部书；左氏宁波之局刻鲍氏《六经》未竣，迁杭州后始成；曾氏于安庆刻《王船山遗书》，亦未刻竣，到同治四年才

在金陵书局完工。此外，这几家书局的设立与清廷毫无关系，完全是几位督抚的自发行为。

但三位督抚以其“中兴名臣”的军功与威望，创设书局刻书的影响是深远的。这表明他们在内忧外患的境遇中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过程中，认识到了设局刊书、恢复和加强封建文教的重要性。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赞曰：

乌乎！粤寇之兴，天下云扰，曾、胡诸公左提右挈，卒夷大难，虽当时将帅攀附多汗马之劳，然所至郡县，即兴学校、讲文艺、崇儒重道；不数年间东南元气逐渐以复，此其纲维国本者，岂不伟邪！^⑩

同治、光绪年间晚清官书局的大规模兴办，实发轫于此。

注：

①刘声木：《苕楚斋续笔》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3月第1版，第283—284页。

②净雨：《清代印刷史小记》，见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中华书局1957年12月第1版342页。

③《清史稿·志·艺文一》（关内本），中华书局1976年7月第1版，第15册145卷4265页。

④柳诒徵：《国学书局本末》，《江苏省国学图书馆第三年刊》，国学图书馆辑，1930年初版，第3页。

⑤同④，第1页。又朱孔彰《曾祠百咏》注：“公捐廉俸三万金设书局，重刊经史，在安庆商之九弟沅圃方伯，刻《王船山遗书》。”

⑥同④，第2页。

⑦陈作霖等编：《泾舟老人年谱》（四卷），民国二十八年铅印本，卷二页八。

⑧徐学林：《曲江官书局是清末最早的官书局之一》，《出版史料》1989年第3、4合期第57页。

⑨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4月第1版，

第 59—60 页。

⑩左宗棠：《翁藩司同爵呈贡各种书籍由》，见《左宗棠全集·批札·同治十年（辛未）》，岳麓书社，1986 年 2 月第 1 版，第 244—245 页。

⑪左宗棠：《札飭鄂粮台翻刻〈六经〉》，见《左宗棠全集·咨札·同治十年（辛未）》，岳麓书社，1986 年 2 月第 1 版，第 491 页。

⑫秦翰才：《左宗棠年表》（手稿本），现藏上海图书馆。

⑬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民国十五年（1926）京华印书局铅印本，卷三，第 3 页。

⑭胡林翼：《〈读史兵略〉序》，清咸丰十一年（1862）春武昌刻本。

⑮梅英杰：《胡文忠公年谱》，民国十八年（1929）宁乡梅氏抱冰堂刻本，卷三，第 12 页。

⑯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序》，民国十五年（1926）京华印书局铅印本。

作者工作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